

习近平幸福观对中国古典幸福观的弘扬与超越

江 畅 潘从义

摘 要 习近平在激活和弘扬以“五福”为核心内容、追求个人生活完善这一包涵中华文化古老基因幸福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观。习近平幸福观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为目标,以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生态全面改善为主旨,以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使命,以各国文明为借鉴、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幸福观。习近平幸福观充分体现了对古典幸福观的弘扬和超越,它将以个人为指向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将个人生活完善转化为人民生活美好,将注重修养转化为谋求发展,将天下情怀转化为人类情怀。它使中国幸福观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历史性跨越,从而实现了从古典到当代、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革命性转化。

关键词 习近平幸福观;中国古典幸福观;新时代;美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4-0005-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20016);2015年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015YZD12)

古老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幸福的民族。早在 4000 多年前的尧舜禹时代,幸福观念就已经萌生并成为中国人最古老的文化基因。中国古典幸福观是指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流行的幸福观。它是以“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为核心内容、追求个人生活完善的幸福观,它认为福祸由善恶所致,是福是祸主要取决于个人,主张求福以避祸。在自秦代开始的 2000 多年的宗法皇权主义时代,古典幸福观淡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化基因由于宗法皇权专制统治而发生了变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在激活和弘扬古典幸福观特别是五福观念这一中华文化古老基因的基础上,根据全球化时代和现代化强国建设实践的需要构建了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观。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为目标,以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生态全面改善为主旨,以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使命,以各国文明为借鉴、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幸福观^[1]。习近平幸福观一方面弘扬了以追求个人完善为目标的古典幸福观;另一方面又在幸福主体、幸福内容、实现幸福的途径等有关幸福的一系列问题上极大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了古典幸福观,对古典幸福观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幸福观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历史性跨越。习近平幸福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引领中国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强起来走向福起来的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同时也是给世界各国人民走向幸福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幸福观对以个人为指向的幸福观的弘扬与超越

任何一种幸福观都有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即所谈的幸福是谁的和是为了谁。中国古代幸福观中幸福的主体是个人,关心的是个人的幸福,包括个人的幸福是什么和个人如何获得幸福。这里所说的个人

通常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并非特指某一特定社会范围的个人。与古典幸福观不同,习近平幸福观在幸福主体问题上不仅讲中国社会成员个人的幸福,更注重中国人民即中国社会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它关注的是如何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幸福观在幸福主体问题上不仅是对中国古典幸福观,而且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旨在解决个人幸福问题的幸福观中的优秀内容的弘扬和超越。

中国最早的五福幸福观是作为“洪范九畴”之一提出来的。洪范的意思是统治大法,洪范九畴的意思是九章统治大法。相传洪范九畴是夏朝开国国君大禹得到天帝的传授而制定的,实际上应为大禹本人所制订。据《尚书·洪范》记载,大禹按九章统治大法治理天下,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他因而被孔子尊为一代英王。洪范九畴的最后一畴即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唐人孔颖达注曰:“五福者,谓人蒙福祐有五事也。”^[2](P81)按孔颖达的解释,五福是一个人获得幸福所体现的五个方面。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五福讲的是个人的幸福,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社会成员全体(即人民)。《洪范》在规定五福之后接着又规定了“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六极更明显地讲的是个人。《诗经·大雅·文王》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说的是永远都要与天命相配,但要依靠个人的努力追求尽可能多的幸福。这一思想受到了孟子的高度重视,《孟子》中两次引用了这句诗文,足见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广泛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虽然都不怎么谈幸福,但他们大多谈理想人格,儒、墨、道、法四大家几乎都推崇“君子”“圣人”人格,庄子还推崇“真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如果我们把通过修身形成的这样的人格视为福的话,这种福也都是个人意义上的幸福。在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家齐国治天下平的观念,但没有作为社会成员整体的人民幸福的观念。

与古典幸福观不同,习近平幸福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幸福观,其根本立场是人民。根据习近平幸福观,人民才是真正意义的幸福的主体,人民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人民幸福的概念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幸福被明确定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指向。习近平还对此作了反复的强调,如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3](P40-41)。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人民幸福对中国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性意义,并且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定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深刻意识到,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作为中国人民忠实代表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3](P40)为此,他要求全党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所说的“人民”当然是指全体中国人民,这种意义的“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他所说的“人民幸福”是全体中国社会成员的幸福。但是,他心中的“人民”也指每一个中国人,他特别关注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美好,把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美好作为自己的责任和追求。因此,对于习近平来说,“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你我他”,是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民整体与作为其中每一成员的人民个体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在谈到中国梦时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3](P36)“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3](P40),“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4](P30)。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5]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又表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6]这些深情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习近平的人民情怀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决心,也饱含着古典幸福观对个体幸福深切

关怀的浓浓人道精神和人文情怀。

中国历史上的幸福观所关注的都是个人的幸福,未曾见以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为主题的幸福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主要着眼于以他领导的国家全体人民的幸福来构建他的幸福理论,同时又运用他所领导的政党的力量为人民谋求幸福,这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弘扬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根据新时代的新情况把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了实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最新发展。从与古典幸福观的关系看,习近平幸福观从古典幸福观的个人立场转向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社会成员普遍的生活美好,同时又站在国家的高度关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疾苦和福祉,这既是对古典幸福观的弘扬,也是对古典幸福观的重大超越。

二、人民生活美好的幸福观对个人生活完善的幸福观的弘扬与超越

立场问题是个根本问题,站在人民的立场与站在个人的立场,将会对什么是幸福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立足点是个人的古典幸福观当然主要是考虑个人幸福,关心的是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落脚点是个人生活的完善;立足点是人民的习近平幸福观所要考虑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它不仅要关心人民中每一个体的幸福,个体的全面发展,而且要重视作为人民整体福祉实现的各方面条件。习近平幸福观最终的落脚点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但关注的重点是人民普遍幸福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条件。因此,习近平幸福观的内涵比古典幸福观要丰富得多。

古典幸福观所理解的幸福就是个人生活的完善,其内涵主要就是《洪范》中所提出的五福。(1)寿,指命不夭折而且寿数绵长,通俗地说是寿命越长越有福。在我国,早在殷商时期甚至更早,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长寿的观念,而且将寿作为福的首要内容。《诗经》中直接使用的53次“福”字中,有21处与寿、考(老)相联系,可见这种观念对传统社会特别是民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富,指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财富与有钱、获利相关联,后来又与贵特别是禄联系了起来,于是富有了富贵的含义。早期儒家并不十分重视富贵,但还是肯定追求富贵是人的自然欲望,不过在汉儒之后,富贵基本上淡出了儒家视野。(3)康宁,其基本含义是身体健康而且内心安宁。康宁作为幸福的内容为先秦各家所认可,不过他们大多主张通过身心修养特别是节情寡欲来实现。(4)攸好德,指的是注重德性修养,使德性不断完善,以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中国历史上各家对德和人生境界的理解各不相同,后来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儒家道德观念。(5)考终命,其字面意思是“老而得善终”。这里的善终意味着善生,即一生都活得有价值,活得好,活得圆满。考终命是对寿的一种限定。一般来说,长寿是福,但长寿的生命要有意义,它必须以慎终为前提。

五福实际上并不是五种福,而是同一种福的五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假如一个人寿命很长而不能考终命,那长寿就不是福,甚至是祸。如果我们把五福看作是一个整体,看作幸福的五种基本规定性,那么它就是一种关于个人生活完善的幸福观。后来《礼记》把这种作为生活完善的幸福明确表达为“福者备也”,而“无所不顺者之谓备”(《祭统》)。《礼记》对“无所不顺”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祭统》)当然,这种备是儒家意义上的完备,主要是指“孝亲忠君”等仁义道德。《礼记》对幸福的界定有明显的儒家倾向,但注意到了幸福生活完备百顺的性质,这是把幸福看作个人生活的整体上完善。这种整体上完善的生活也是一种和谐的生活。《诗经·小雅·蓼萧》云:“和鸾雝雝,万福攸同。”这句诗是表达祝福的,原意是铃铛声音和谐优美,祝愿大家同福多福。

对于传统五福把幸福理解为个人生活的整体上完善的思想,习近平幸福观是充分认同的。它强调个人的好生活不只是好的物质生活,也不只是好的道德生活,而是物质生活、道德生活乃至整个生活都

是好的。它强调社会与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和谐有机整体。这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弘扬和创新。习近平始终对人民幸福给予了最深沉的关切,并将其作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头等大事。他曾深情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3](P4)正是敏锐洞察到并无比关切每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期盼,促使习近平始终把“人民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牢记在心,将“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贯彻于他的治国理政全过程,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追求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

习近平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了全面的概括。他指出,在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7]。他还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在民生方面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其二,在民主方面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其三,在法治方面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其四,在公正方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其五,在安全方面“建设平安中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其六,在环境方面“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总体上看,人民美好生活就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生活,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生活,是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活,是人民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生存发展的生活。

习近平幸福观像古典幸福观一样重视个人整体生活的美好,但他将个人整体生活的美好与社会的美好联系起来,认为美好生活是通过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将美好生活、美好社会与良好生态联系起来,强调美好生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同时不只是将美好生活理解为静态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生活,而是理解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尽可能充分满足从而获得充分满足的生活,人获得全面发展的生活。习近平幸福观包含了传统五福观念中的所有合理因素,又在此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幸福的内涵。如果说古典幸福观的基本内涵是个人生活的完善,那么习近平的幸福观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生态的全面改善。同时习近平对个人幸福的理解也不限于个人生活的完善,还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开发,开发出来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就内涵而言,古典幸福观的关键词是生活完善,而习近平幸福观的关键词是全面发展,它强调个人、社会和生态全面而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幸福观是对当代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人类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满足问题作出的系统而积极的探索和回答。它在吸收传统文化优秀内容以及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元素和当代最新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幸福观念的超越和创新,使人类幸福的内涵获得了空前的丰富。

三、谋求发展的幸福观对注重修养的幸福观的弘扬与超越

完整的幸福观,既包括对什么是幸福的理解,也包括对如何获得幸福的策划。传统五福幸福观对如何获得幸福有系统的阐述。《洪范》是统治大法,也是价值体系。从幸福观的角度看,它包括了对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的回答。五福是九畴中的最后一畴,它实际上就是大禹设定的社会价值目标。前面的八畴大致上可被视为实现五福的途径,如谨慎于君王自身的五条原则(“五事”),勉力办好的八项政务(“八政”),君王的统治准则(“皇极”)等。这表明五福幸福观作为统治者的幸福观,它是务实的。但

在后来的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思想家们特别是儒家越来越重视道德,片面地发展了五福中的攸好德,使修身特别是修养德性成为实现幸福的主要途径,以至于《大学》中宣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习近平幸福观也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完善,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对人的全面发展和过上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但它更重视全社会每个成员获得全面发展和过上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面临的各种问题。习近平不只是有善良愿望的思想家,而且还是有胆识、有气魄、有远见、有智慧的政治家,他亲自谋划如何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并创造条件加以实现。他诉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来提供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并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其着眼点是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协调发展,为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创造充分条件。

在夏朝,修养德性只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视为获得幸福的一种途径,但绝非唯一的途径。到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从对社会动乱的反思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个人修身对个人“成人”(君子 and 圣人)以至对家庭、国家和天下有序和谐的根本性作用。在孔子看来,修身有三个重大意义:一是“修己以敬”,即修己可使人认真对待人生的一切问题,以在世上安身立命;二是“修己以安人”,即修己可以使人善待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三是“修己以安百姓”,即修己可以使人给百姓带来安定,造福民众(《论语·宪问》)。孟子认为,修身的使命就是使人固有的“仁义礼智”善端“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这些善端如果不求就不能得,就会失去。它们“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尽心上》)。所以,人生在世,必须保存和扩充所有这些善端。保存和扩充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而修身就是“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孟子·尽心上》)。“尽心知性”可以知天;“存心养性”则可以事天。《大学》将孔孟的修身思想概括为“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以修身为核心的“三纲八目”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根本路径,即内圣外王之道。从此,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了儒家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十分推崇儒家重视修身的做法,大力弘扬儒家的修身思想。他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说,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论语》中所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他希望同志们“吾日三省吾身”,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8]。然而,习近平幸福观更重要的建树在于针对当代中国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提出了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系统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重大举措。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7]。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规划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和九条重大举措,确立了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等多个具体领域的强国目标,并决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等重大发展战略。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把坚持新发展理念看作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他指出:“这五大发展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4](P200)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及其主要矛盾作出重大判断,提出并坚持新发展理念,制定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基本方略和主要措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超凡智慧、高超才能、卓越胆识和雄伟气魄。所有这一切使习近平幸福观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新水平、新境界。

发展需要动力,伟大梦想、美好蓝图需要奋斗才能变成现实。习近平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4](P43)。他说:“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7]他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3](P41)他反复强调,幸福需要辛勤的劳动来创造,需要实干,需要“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9];“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3](P4);“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10];“实干才能梦想成真”^[3](P48)。

个人身心修养是获得幸福的主观条件,但仅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幸福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创造全体社会成员过上更加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才是解决该社会幸福问题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提和保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P502)习近平既以思想家的敏锐眼光认识世界,又以政治家的雄伟气魄完善世界。他立足中国现实,放眼当代世界,面向未来发展,深刻洞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围绕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和理论创新,运用创新理论制定行动方案并付诸实施。这种实践—方案—理论的良性互动过程在循环往复中不断上升和前进,其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现实途径,也从根本上克服了古典幸福观的空想性和局限性,使中国幸福观实现了从古典到当代、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革命性转化。

四、人类情怀的幸福观对天下情怀的幸福观的弘扬与超越

纵观历史,迄今为止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基本共同体^①之中。人的幸福是直接与生活共同体(社会)的好坏相联系的,但同时也受境外基本共同体的影响。当一个基本共同体与境外的其他基本共同体处于和平状态时,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才可能幸福生活;相反,如果它与其他共同体处于战争状态,交战各方的人民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自夏朝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多数时期国家都是大一统的,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虽然在华夏民族周边也有一些不属于华夏民族的少数民族,但他们通常也因为中原统治者的恩威而向其称臣进贡。因此,中国自尧舜时代就有了“天下”观念,范围涵盖华夏民族及外域的民族,即古人能够想象的世界。古代中国对周边民族始终是友好的,视之为兄弟,因而中国人有一种天下情怀。从这种意义上看,古典幸福观是一种具有天下情怀的幸福观。当然,这种“天下”今天看来在疆域上非常有限,充其量不超过东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才使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过去天下概念的局限,逐渐形成了世界的概念。今天,中国不仅参与了世界化、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向现代化强国迈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共同价值体系建设,就成为了习近平幸福观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习近平幸福观在继承、弘扬古典幸福观的天下情怀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情怀、人类情怀。今天的世界、人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万邦”“天下”。它是具有人类情怀或世界情怀的幸福观,或者是完全意义的天下情怀幸福观,而古典幸福观只是不完全意义的天下情怀幸福观。

《尚书·虞夏书·尧典》就有“协和万邦”的记载,说的是尧德才超凡,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继而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进而使各国都团结起来,使天下老百姓都快乐和睦起来。这里的“万邦”在地理空间上涵盖的范围与后来所说的天下是相同的,而天下就是远古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因此,“协和万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协和世界”。这种思想观念虽然后来没有得到多少思想家的直接阐发,但其精神深

^① 基本共同体指给人们提供基本生活和安全保障的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先后作为人类基本共同体存在。今天,国家成为人类普遍的基本共同体。

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古老的中国虽然经历过多次民族内部的斗争和融合,但几乎没有对外扩张、侵略和掠夺的历史记录。中华民族未曾有过对外的“血与火”历史,相反有许多目的在于与边界接壤地区建立友好关系,促进相互间交往与合作的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政治解决边界武力冲突的友好活动和努力,其中最有影响的如:“和亲”,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去印度取经,郑和七下西洋,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维护。这些“协和万邦”的行动对促进相互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类世界化、一体化进程起过重大历史作用。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整个历程都渗透了先祖尧所奠定的“协和万邦”精神。中华民族的这种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无疑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和中国人安土重迁有密切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根源于中国先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及其扩展的“民胞物与”观念。

在经济全球化、人类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谋求中国的全面而快速发展,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思想文化和发展经验,也需要和平、安全、合作的世界环境。习近平不仅对此有着深刻的意识,而且作出了一系列远见卓识的谋划。他指出:“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4](P545)“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7]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使全体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二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共赢共享的发展前景。“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3](P266)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承担起大国的世界责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P258)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习近平指出,只要世界各国秉持宽容精神,就可以消除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和谐。他要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与各国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在,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影响深远^[3](P265)。在中国作为快速崛起并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今天,中国要有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和担当,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动者。《诗经·大雅·大明》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这句诗是讲周文王言行谨慎、德性高尚、正大光明地侍奉上帝,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为百姓谋更多福祉,所以各国都归附和推崇他。习近平弘扬和创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协和万邦的优良文化传统,将古典幸福观有限的天下情怀推向了全人类、全世界,使之具有充分而完整的意义。习近平根据当代世界新情况对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关系的深刻阐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张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他的世界视野、人类情怀以及作为大国领导人的站位高度和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的责任担当。这一切都是古典幸福观所无法比拟的。

参考文献

- [1] 江畅. 论习近平幸福观. 思想理论教育, 2018, (1).
- [2]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5] 习近平. 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 人民日报, 2017-11-11.
- [6] 打响扶贫攻坚战“领路人”习近平不让一个人掉队. 人民网, 2016-02-10. [2018-01-06] <http://hi.people.com.cn/n2/2016/0210/c231187-27716007.html>.
-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2017-10-28.
- [8] 习近平. 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08-01. [2018-01-06]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801/c168825-25385445.html>.
- [9]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 人民日报, 2017-01-01.
-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人民日报, 2018-01-01.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Xi Jinping's View of Happiness on Chinese Classical View of Happiness

Jiang Chang & Pan Congyi (Hube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China entered into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socialist outlook of happines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globalization era and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modern powerful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activa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lassical view of happiness, the ancient gen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lassical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which has been formed and popular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s a view of happiness taking “five blessings”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pursuing the perfection of personal life. While Xi Jinping'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is people-centered,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the all-round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y, and the mission of solving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New Era, taking other civilizations as reference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round the globe. Xi Jinping'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which is beyond the classical view of happiness, reflects in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ndividual into the people, the perfection of the personal life into the wonderful life achievement of the people, the emphasis on self-cultivation into the pursuit of development, the world feelings into human feelings, etc. The conception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historical leaps in China, and achieved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to contemporar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from ideal to reality.

Key words Xi Jinping's view of happiness; Chinese classical view of happiness; New Era; good life

■ 收稿日期 2018-03-31

■ 作者简介 江畅, 哲学博士,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62。

潘从义,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浙江 温州 325035。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叶娟丽